

10. 97
常山文庫資料集
92
17

47.0-12
常 州 文 史 资 料

第 二 辑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江 苏 省 常 州 市 委 员 会 文 史 委 员 会 编**

1982. 10

目 录

我所知道的恽逸群同志·····	顾雪雅(1)
民国初期常州报纸简介·····	徐惠卿(16)
常武地区抗战时期的革命报刊·····	蒋仁法(24)
我所见到的《太湖报》·····	徐回青(35)
沦陷时期的常州新闻事业·····	沙 碧(39)
汪伪时期的《武进日报》·····	沈立行(41)
天宁寺佃农抗租斗争·····	<u>张云鹤</u> (45)
共产党教育我爱国抗日·····	庄泉玉口述、陈吉龙整理(55)
抗战时期的一张便条·····	常 民(65)
新四军在武南的战斗生活片断(照片)·····	时 楨逸(68)
漫话天宁禅寺·····	宗 民(72)
常州基督教堂的变迁·····	毛吟槎(80)
回忆辅华中学·····	汪绍先(84)
常武地区清末民初的私塾·····	蒋守正、蒋裕伯(96)
清代常州部分知名书法家·····	李镇瀛(101)
京剧票界史话·····	石 人、山 亭、邵 因(108)
卖糖春秋·····	阿 苏(122)

我所知道的恽逸群同志

顾雪雍



老革命家、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恽逸群同志逝世已四年多了。全国各地许多报刊发表悼念文章，赞扬他一生对革命所作的贡献，作为他的外甥，我对他的事业和为人，更是深深地怀念和敬仰。

“不愧南田后人”

恽逸群同志于清光绪三十年（一九〇五年）出生在江苏省武进县南乡上店镇寿山庄。先世六代为医，其父恽兆冈改业塾师，后转入仕途，任候补县丞（八品佐杂小官）。恽兆冈写得一手好字，又善作画，特别是胆识过人，急公好义，为各方器重，获得“不愧南田后人”的声誉（清朝大画家恽南田的父亲恽逸庵，明亡后组织民兵反抗满清，在浙闽边境被清兵击败，改穿僧服在各地组织反清力量，最后饮恨而终。南田两个哥哥作战牺牲，南田也被清兵俘虏罚作奴隶，为杭州灵隐寺老和尚救出，从此专心绘画，成为我国的大画家。他终身不给清王朝做事，以气节高尚著称）。有一件事使恽兆冈名扬常州，

当时有一批被遣散的淮勇百多人，由一名二品记名副将率领，从浙江运来私盐几十船，在常州四乡强行推销。他们恃强横行，在上店、南夏墅等街镇用盐包把商店、住户的大门堵死，如不出高价买他们的盐，就不得开门。他们还绑架勒索、抢劫、开赌、无恶不作。这个副将的官阶比常州知府还高，吓得知府和县官不敢过问。恽兆冈决心为民除害，就不顾个人安危，招集乡民百多人用锄头、扁担把这伙武装的游勇散兵打败，又带领乡民押解俘虏几十人上城请愿，并通过关系迫使知府把他们判罪充军。这件事曾被人编为沪剧在上海演出，戏中把恽兆冈扮成智勇双全的“大将军”。恽逸群同志虽然四岁丧父，但他父亲舍身为公的优秀品德，早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种子，因此他自小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有一次他听人讲《白蛇传》，听到善良的白蛇被法海和尚收入钵中时，放声大哭，就把画象上法海和尚的头用香烧掉，为可爱的白娘娘“报仇”。以后他读书懂事，更对历代的昏君、奸臣、欺压人民的坏蛋深恶痛绝，决心做一个正直的人，为国家 and 人民干一番事业。

“科学救国”幻想破灭

恽逸群同志四岁进私塾读书，他手不释卷，刻苦用功，到十四岁时，竟读完了《六经》全部和《史记》、《资治通鉴》、《汉书》的大部，以及当时报刊上倡导革命，鼓吹改良的“时文”，这对许多成年人来说也是不容易办到的。因此有的塾师竟担心被这个小学生的提问难到，而不敢收他做学生。勤奋增长才干，他的文章在南乡历次比赛中名列第一，于是许多人鼓励他参加县城里的“三益文社”（负责全县写作比赛的组织）。当时参加文社的二百人，都是全县写文章的能手，由名进士钱

名山负责评卷。他这个十四岁的小学生大胆应试，居然名列三十名，被全县传为美谈。他不倦地追求知识，在文史方面打下了较好的根基，但他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数理专修科攻读，因为他认为积弱积贫的中国，只有“发展科学”、“振兴实业”，才能得救，因此决心当一个科学家。当时念大学费用很大，他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已负担不起他的费用，他对母亲说：

“家当是害人东西，都卖卖掉！”但他母亲终于舍不得破产而强迫他辍学。他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被介绍到无锡电话公司，当练习生，后提升为技术员，在积蓄了一些钱后辞职，准备回大同大学完成未竟的学业，但一九二五年帝国主义在上海对中国工人、学生的大屠杀（即五卅惨案），把他“科学救国”的梦想打破了。他痛感到不把帝国主义强盗赶走，中华民族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就下决心投入反帝斗争，到上海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随即参加了国民党，回常州担任小学教师，一面在国民党县党部任常委，发展组织，动员民众，不久又在国民党省党部中的共产党人指引下，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遂于一九二六年由乔心全介绍参加了共产党。

奔 波 着 的 年 轻 人

从此，在常州城里狭窄残破的街头巷尾，经常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头发蓬松，身穿一件褪了色的蓝布长袍，脚穿一双沾满尘土的布鞋，腋下夹着纸包，匆忙地走进一家家工厂、学校，把包里的《共产主义ABC》、《共产党宣言》、《响导》、《新青年》等小册子，小心地塞进朋友的手中。他没有固定的职业，没有固定的住处，每天忍饥挨饿地奔波着。亲戚们见了他的寒酸相，无不摇头叹息：“长安真没有出息

啊！”

恽逸群同志（字长安）在地主绅士眼里确是“等没门庭”的。他放弃收入多的职业，也不愿投靠显贵的亲戚。他舅父宋雪琴是江苏督军兼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驻沪办事处处长，为了表示器重他，曾“屈尊”来看望他，他却说：“我就是看不惯有钱有势的人”，避不见面，而甘愿过清贫困苦的生活。岂但如此，在军阀统治下，宣传“共产”是要杀头的，他却毫不畏惧，他早已抱定为主义不惜牺牲生命的决心了。

“卖田借债干革命”

一九二七年春意盎然的三月，北伐军势如破竹，攻入江苏省，军阀部队节节败退。恽逸群和他的战友们在北伐军就要进入常州时，通过党团员发动常州最大的申新六厂（今国棉二厂）、大纶纱厂（今国棉一厂）的工人停车、停工。后来又接管了政权，开展各项社会改革工作，在农村抓土豪，在城市斗劣绅，组织工会、农会，改善工人生活，提倡男女平等……但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席卷而来的反革命恶浪立刻将这一切淹没了。从省委到地方的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屠杀，恽逸群同志等被迫撤退到乡下。仇视人民的反动绅士、资本家得意忘形，在文庙（现工人文化宫）勒碑刻石，表彰反动派镇压“伏匪”（对共产党和革命民众的污蔑性称呼）的“丰功伟绩”。当时党在工人中还有很大势力，总工会负责人是中共党员，地下党领导着电气工会、水木作工会，在纱厂和布厂工会中党员也占优势。当时担任中共常州市常委的恽逸群同志为了把斗争进行下去，冒着生命危险潜回城里，

和一个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人士，合力创办了逸仙中学（设在药王庙），作为党的据点，在工人、学生中继续展开活动。他把家产几十亩田抵押掉，又借债一部分，共得款约一千块银元，全部用作学校和地下党的经费。当时有些人讥讽他说：

“卖田借债干革命，长安真是书呆子！”但他认为，干革命生命都可以牺牲，倾家荡产又算得了什么！在党的力量又重新开始发展的时候，白色恐怖却越来越严重了。不久，总工会和逸仙中学被封闭，恽逸群同志和许多党员被逮捕了。

农 村 斗 争

任凭反动派酷刑折磨，恽逸群同志拒不招供，反动派也找不着他是地下党领导人的证据。依靠广泛的社会关系，恽逸群获保出狱。他又接任了中共武进县委的第二任书记，在南乡的前黄、谭庄、都家桥成立了三个党支部，发动农民抗租斗争，矛头首先指向苏南最大的地主天宁寺。天宁寺有万余亩租田，寺主口口声声“大慈大悲”，对农民的压迫榨取却比世俗地主还凶狠。党组织鼓动群众对天宁寺“清算浮收”、抗不交租，农民一呼百应，把收租的和尚赶跑，把抗租斗争广泛开展了起来。

农民运动的发展使反动派极为恐慌。军警下乡镇压，把积极鼓动抗租斗争的党员、小学教师蒋和兴和前黄公学支部的四个党员教师（一个是现任省文管会主任陈枕白同志，一个是前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徐迈进同志）捉进常州城。这时恽逸群同志被调任宜兴县委书记，又在宜兴开展农民斗争（继任武进县委书记的是管文蔚同志），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千方百计追

捕他。一九二九年他被迫转到浙江，在陶行知先生参与创办的湘湖师范学校当教师，在该校和农村建立了十六七个党支部，并先后任肖山县委书记和浙北特委秘书长。但伸向他的反革命魔爪，不久又迫使他转到苏北响水中学校教书去了。他在江浙两省不同的战斗岗位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投入新闻战线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江苏省委遭到多次大破坏，恽逸群同志和党失掉了联系。怎样继续为党作出贡献呢？他毅然投入新闻战线。

一九三二年他进入上海新声通讯社任记者，接着又参加《立报》任编辑和主笔。日寇自侵占东北后，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而步步紧逼，华北告急，国难日甚一日。人民不愿做亡国奴，“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相继爆发。恽逸群同志在《立报》每天晚间编完稿后总要写一篇社论，他在这些社论中有力地喊出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不断地宣传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作为影响很大的抗日团体“救国会”的发起人，列名该会《宣言》，要求国民党改变不抵抗政策，实行抗日。接着又接受“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的邀请，赴香港和金仲华、胡愈之等一起编辑《生活日报》，在海外华侨中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抗战开始，日寇占领沿海各省，上海租界成为被日本军队包围的“孤岛”，日寇和汉奸的魔爪伸进了租界，但有数百万人民的上海租界依然是抗日的重要据点。党派恽逸群同志在上海利用外商名义开办《译报》、《导报》，进行抗日宣传。他分别担任两报总编辑和主笔，除

为这两张报写社论外，还为其他三家报纸组织社论。《译报》、《导报》成为党在上海和华东沦陷区的主要言论机关，它刊登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和党的主张，对处于华东地区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来说，是多么大的鼓舞啊！

恽逸群写的文章，笔锋犀利。凡他主持过言论的报纸，无不以言论精辟而受到广大读者的称赞。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九三六年爆发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国民党内亲日派何应钦调集大军，准备大举进攻西安，而日寇则在东北、华北调兵遣将，伺机扩大侵略，这时内战扩大，外侮日迫，国家形势危如累卵，国内外舆论都认为中国前途十分悲观。而恽逸群同志运用唯物辩证观点，分析帝国主义和我国各派政治力量的错综矛盾，在《立报》的两篇评论中，断言“西安事变有和平解决之可能”，“中国决不会变成西班牙第二”，引起国内外舆论的瞩目。不久事实证明他预见的正确。于是，他写的《立报》社论就被苏联塔斯社等一些外国通讯社视为中国人民舆论的代表，而不断被拍发到国外。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亲日派头头汪精卫在重庆不断发表诬蔑抗战和散布“抗战必败”的悲观论调，因为汪是国民党副总裁，没有人敢公开批评他。恽逸群立即在上海《导报》发表题为《异哉汪精卫之言》的社论予以严正挞伐，这是当时全国报刊上第一篇声讨汪精卫卖国行径的言论。他在社论中指责汪的言论与梁鸿志、王克敏（都是老牌汉奸）如出一辙，果然，汪很快就逃出重庆，到南京成立伪政府，当了日寇的“儿皇帝”。他的政论作出的科学预见，一个个为事实所证明，使他多次获得“彗星”（意为光芒四射）的赞誉，而作为名记者、名政论家蜚声于中国新闻界。

“韧性的战斗”

他紧握战笔，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冲锋陷阵，所有敌人都对他切齿痛恨。一九三七年，国民党对抗战采取消极态度，不动员广大人民，并暗中进行求和的卖国活动，因而造成节节败退。恽逸群同志在上海报刊上大事抨击，反动派恼羞成怒，密谋派特务绑架暗害他。他得到有关方面通知，立刻迁居到法租界总巡捕房对面的一个好友家隐藏（国民党特务不敢到那里捕人），继续进行战斗。那时我曾多次到那里去取他写的批评国民党的文稿送往报社。一九三九年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后，他又在报刊上不断揭露批判日寇的“共存共荣”、汪伪的“和平救国”的反动言论，使日伪的宣传受到严重打击。因此，日寇、汪伪把他列入要暗杀的“抗日顽固分子”名单的最前列。当时上海抗日报社被日伪特务投掷炸弹，编辑、记者被绑架、暗杀的事件不断发生，恐怖活动非常猖獗，但他没有被敌人的腥风血雨所吓倒。他又隐藏起来，经常迁移住处，继续挥笔向敌人冲杀。恽逸群同志在反动统治下，坚持不懈地进行着鲁迅所主张的那种“韧性的战斗”。这种战斗不仅要勇敢不怕死，还要机智、灵活，具有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的能力。他的这种战斗风格和作战本领，在当时新闻界中是很突出的。一九三九年夏衍同志在桂林创作剧本《心防》，反映文化工作者在日伪统治下艰苦的地下斗争，剧中主人公之一新闻记者刘浩如，怀揣遗嘱，随时准备牺牲，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进行巧妙、顽强的战斗，这个“刘浩如”就是指的恽逸群同志。恽逸群同志父子两人先后被编成戏剧上演，虽然一个是武，一个是文，但他们舍身忘死、沥胆为民的精神，同样可歌可泣。而恽逸群同志为

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战斗，贡献更多，献身的事业更伟大。

当恽逸群同志在上海出生入死的危急关头，党及时把他调往香港。他主持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国新社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创办，领导同志为范长江、胡愈之、孟秋江、恽逸群等），向海外华侨报纸和各国进步报刊寄发中英文稿件。他写了许多文章，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把党和人民的主张和意见传播到世界各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他又奉命转移到日寇统治下的上海，开始又一次危险的“韧性的战斗”。

他依靠广泛的社会关系，打入上海汉奸报《新中国报》和日寇秘密机关《岩井公馆》（岩井是日寇的驻上海总领事）做地下工作，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他又以巧妙的笔法，在汉奸报上写文章，阐明抗战是共产党逼迫蒋介石打起来的，蒋介石有意求和，蒋帮各派如何争权夺利等事实真相，暴露蒋帮反人民的本质，叫沦陷区人民不要对蒋介石有幻想。他的活动受到日寇的注意，终于被日寇宪兵队逮捕入狱。他在酷刑下坚贞不屈，到抗战胜利前夕才获释放。

勤 奋 著 作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他被派往华中解放区，前后担任《新华日报》、新华社、《大众日报》、《新民主报》社长、总编辑，华东局代理宣传部长等职。上海解放后，任《解放日报》社长、华东新闻出版局长。作为党的新闻事业的领导人，他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他还参与创办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并任香港新闻学院教授、华中新闻学校校长和华东新闻学院院长，为党培养了大批新闻干部。

恽逸群同志一生勤于著述，散见于各地报章、杂志者不下

千百万言。我在他上海住所，经常在晚间看见一二报社勤务员来取社论稿，他总是叫勤务员在旁稍候，提笔一挥而就，其文思敏捷如此。在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他对近代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历史演变与相互关系，以及重大事件的内幕，掌握了丰富的资料，作了深入的研究，加上他记忆力惊人，因此对错综复杂的中国近代史历历如数家珍。解放战争初期新华社公布国民党战犯四十三人的名单，当时解放区报社缺少资料，他在晚间收到电讯后，立即凭记忆把这四十三人的别号、年龄、籍贯、现职一一写出见报，被解放区报纸纷纷转载。由于他学识渊博，在新闻界有“百科全书”、“活词典”之称。

他一生为革命工作奔波劳瘁，几无暇晷，但仍在百忙中积累资料，潜心研究，写下了一些重要的历史著作，如《蒋党真相》，对蒋介石如何玩弄阴谋权术维持廿多年反动统治的内幕，以及蒋党各派的内情分析精辟入微，至今仍为史学家推崇，认为同类书籍中无出其右者。他又写了《中国内幕异闻录》、《吴佩孚评传》、《杜月笙论》、《虞洽卿论》等，对中国近代政治和历史人物作了深刻的分析。此外还有《新闻学讲话》、《抗战国际知识》等著作。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恽逸群同志谦恭温厚、平易近人。他对青年人总是热情指导帮助，从不以长者自居，对革命同志则坦率热诚，无利己之私心，多助人之善意。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同志颠沛流离，他经常拿出自己的工资接济他们，而自己则过着俭朴的生活。他纵谈古今，喜欢直抒己见，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党内，他经常提出建议和意见，揭露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对上级领

导的不正确意见，从不随声附和，或曲为遮掩。他大公无私、嫉恶如仇的品格，正表明他坚定的党性。但少数有封建思想作风的当权者，对他自然不能容忍。野心家、阴谋家饶漱石、张春桥利用他的某些缺点，对他进行报复打击，三反运动中把他开除出党，贬为北京辞书出版社、地图出版社副总编辑、古籍出版社筹备处副主任，从七级干部降为十级。一九五五年又因潘汉年案的牵连（潘任华南局、华东局书记时，他任秘书），被加上莫须有的“叛徒、汉奸”的罪名而入狱达十年之久。一九六五年出狱后被贬谪到苏北阜宁中学图书馆管理图书。

他虽历经磨难，身处逆境，而从不以个人的得失萦怀，仍为党为国、矢志不渝。在阜中时他已年逾花甲，仍为整理、登记图书终日操劳，并抽暇埋头读书，读完了《马恩选集》、《列宁选集》，还经常就国计民生问题向周总理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宝贵建议。他在给周总理等的信中说：“深感平日在党内侃侃直陈，触人痛疮，当引以为戒，但本性难改……终认为隐瞒自己的认识和见解，即为对党的不忠实……”，“文化大革命中怪论层出，忧心如捣……终不甘也不忍袖手旁观……”，

“平生耻为乡愿，不惯于趋合潮流，荣辱祸福，久置度外，心所谓危，不敢不言，苟于党于民有毫发之益，则摩顶放踵，亦所不吝……”。

正因为他对党赤胆忠心，不以个人利益为念，所以他在乌云翻滚、恶浪滔天的“文化大革命”中，一再向党和人民大声疾呼，批评党的严重左倾错误，并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见《毛主席语录》满天飞，便写信给中央一位领导人，对林彪别有用心地炮制的《再版前言》表示“深感不安”，认为“武器（指理论）可以杀敌人，

也可以杀朋友，杀自己兄弟，也可以自杀的”。后来林彪、“四人帮”利用毛主席的片言只语来制造武斗，杀害革命老干部和群众的血腥事实，证明了他的看法的正确。

他针对林彪、“四人帮”掀起的个人崇拜恶浪，于一九七三年八月写了题为《平凡的真理》的文章，对个人崇拜产生的根源和危害作了透彻的分析，指出：“凡是把国家最高领导人神化的，必定有奸人弄权，阴谋篡夺权力，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例外的普遍规律。只有根端糊涂的人，甚至接近白痴的人才会相信自己是天生的圣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不会错误，不会受人蒙蔽愚弄，因此受奸人的愚弄，至死不悟。”历史已证明他的意见是何等正确、精辟！

当“四人帮”大事宣传“儒法斗争”时，他于一九七三年写了《也谈儒家和法家》，列举事实指出，“四人帮”宣传的所谓“儒法斗争”，是“随心所欲地胡谈一通”，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标本”，有力地批驳了他们歪曲历史的谬论。

他针对“四人帮”的恶劣文风，于一九七三年八月写了杂文《论新八股》，认为“文革后出现的新文体，不论什么内容，首先引用几句领袖的话，然后再入本题，以下每一段又引用一二句领袖的话再加发挥，以所论述的事情来证实领袖的理论而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是十足的‘代圣立言’，是一种‘新八股’的歪风”，是继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以后老八股几次复辟的又一次“借尸还魂”，从而彻底揭露了这种文风的封建反动性。

一九七〇年他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关于加速工业化的建议》，列举“文化大革命”后经济凋敝、民生困苦，党员干部政治经济地位特殊化、严重脱离群众等事例，建议从制度上着手改进党风，以及征收个人所得税，改善农民生活等。他的

这些建议，和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精神是相符的。

恽逸群同志早就受够了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的长期折磨，十年内乱期间，他在阜宁被挂牌、游街、批斗、罚扫厕所、做力不胜任的繁重劳动，又受尽了凌辱摧残。这个衰迈老人的生命之火眼看快要被狂风暴雨吹灭时，他仍没有颓丧，没有叹息，没有畏缩，依然怀抱着对党的坚定信念，默默地写了以上光芒四射的篇章，不屈不挠地进行顽强的战斗。他明知这些文章会招来杀身之祸，但他忧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党和国家的命运。当他辗转病榻的时候，他还在向阜中的教师呼喊：“我的病不要紧，可是国家怎么好啊！别人不知道江青的底细，她要当皇帝啦！”“现在的报纸都在撒谎，他们在欺骗人民啊！”而对派来监视他的“造反派”，他毫无畏惧地告诉他们：“我的观点就是这样，你们看着办吧。”这些言行，反映了他忧国忧民的胸怀，刚直不阿的品德，为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的斗争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宝 贵 的 遗 产

他用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顶住了一个个惊涛骇浪的打击。他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德，在他一九七三年致胡愈之同志的信中表露无遗：

“愈之兄：

阔别逾十八年，变化之大，非所逆料。孟如、希天、可权（编者注：孟如指金仲华、希天指范长江、可权指孟秋江）迭出下策，闻之愕然。弟之遭遇，非楮墨所能宣，但既未抑郁萎顿而毕命，亦未神经错乱而发狂。平生以‘不为物移，不为己忧’自律，经此二十年检验，幸未蹈虚愿。僻处海隅已七年有

半，子女均不通音问，内人老病，依女居滇南，亦无书信往来。弟虽多病，然数年来绝少休假，所业常逾于壮年同事，居常钦佩羡慕陆务观老骥伏枥精神，而鄙杜子美嗟老叹贫之想，（编者注：陆务观即陆游，杜子美即杜甫）终日历碌，亦颇怡然。唯此，我不至貽故人羞耳！”

他在阜宁的十二年是不容易度过的。他年老多病，孑然一身，无人照料，只有他的姐夫、姐姐（我的父母）经常寄食物、衣服去照顾他，并在后来三、四年间，在他每年冬天气管炎发病时，派我的儿子去把他接来常州我家疗养半年。“四人帮”打倒后，他长住我家疗养，病体康复了，又眼见党拨乱反正，改变了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走上正确的航向，他的心情是多么愉快、振奋啊！他对我说：“我还想为党工作十年。我有多少工作要做啊！”在那些日子里，他查阅《史记》等史书，整理手稿和资料，拟订庞大的写作计划，他急迫地想用加倍的努力，夺回二十多年被无辜剥夺了的宝贵时间，为四化事业作出贡献。他决心要写一部《民国史话》，和他人协作，从我国上下数千年的史书提供的资料中，分门别类，录编成浩瀚的《中国历代社会史资料》，他打算通过自己一生经历和见闻，反映中国近代翻天覆地的变革……。党中央组织部根据他的意愿，一九七八年九月安排他到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我护送他前往，为他安排好生活。正当他开始着手进行著述计划时，不幸于当年十二月十日因病溘然长逝，终年七十三岁。

他头脑中蕴藏着的宝贵财富——党史、社会史、新闻史……终于没有能遗留下来，实在是党和人民的极大损失。但可以告慰他英灵的是：中央公安部已为他平反昭雪，洗刷了使他长期受诬陷迫害的不白之冤；他的战友们已收集了他的遗著五十万字，即将出版《恽逸群文集》。他的熠熠发光的道德、文